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经济学（第五辑）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

经济计划的原理

柯尔(G.D.H.Cole)著 黄澹哉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经济学（第五辑）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

经济计划的原理

柯尔 (G.D.H.Cole) 著 黄澹哉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计划的原理/ () 柯尔 (Cole, G.D.H.) 著; 黄澹哉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经济学)

ISBN 978-7-5520-1195-1

I. ①经… II. ①柯…②黄… III. ①计划经济学
IV. ①F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6275号

经济计划的原理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刷 印: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8.2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195-1/F.388

定价: 126.00元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苞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柯爾 (G.D.H.Cole) 著 黃澹哉 譯

經濟計劃的原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序

著述此書所受到的困難，遠超我的預料所及，我動筆不久，就明白看出困難在什麼地方。完全從理論方面去說明一個無計劃的經濟之缺點，或是闡明經濟計劃的基本原則，都不費力。但是我懷疑一個純粹理論的說明，實際上是否大有助於一個多災多難的世界，結果我從本書中抽出了幾章，而在這幾章中我本想解決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幾個較為複雜的理論問題。例如我已準備用幾章來詳論在計劃的生產制度下物品定價的理論根據，在完全的計劃制度下一個社會主義預算的結構，以及在基於計劃的收入分配與集合的資本累積方法的經濟下居間交易的理財方法。但是最後我把這些都刪了，因為目前這些事祇能使小部分的讀者感覺興趣，他們大都愛看範圍較廣的經濟計劃的著作，我不願過分專門，並且我覺得我若能先把計劃經濟的基本原則說明白懂清楚，我纔更有希望使這些問題的著述有益有用。

我不但要討論計劃的原則，並且也要論及適用這些原則的方法與計劃經濟為統制其中各

事務而設立的組織。至此我立刻又受到一個困難。任何社會的經濟組織，勢必與其政治組織（國家與地方的）有密切的關係；而這一點尤適用於一個在集合統制制度下從事計劃其經濟生活的社會。這種社會的經濟結構必與其政治結構緊相調和，因為此二者在各主點上非相接觸相交又不可。因此不對與其相連的政治結構加以假定，就不能闡明經濟計劃的組織。試舉一例，假使議會制度仍在，那必使經濟機關適合於最後議會管理的條件，適合於從最高議會取得權力（在理論上）的內閣制政體。在另一方面，假使沒有這個假定，那末從蘇維埃主義與工團主義到法西斯主義與企業組合主義，都要立刻發生無數不同的可能性，但是由考量這些無際無涯的可能性而寫成的著作，不是關於經濟計劃，但是關於政治與實業的將來。加之像這一本著作不是篇幅要比本書多幾倍，就是不能把握住本書原來要討論的經濟計劃的問題。於是我排亂除雜，假定議會制度下採用這種計劃，而加以修改，使之能執行一個計劃經濟制度所必有的大量公共活動，以限定本書的篇幅。我也假定如目前相同的地方政府機關，但我又因為集合的組織與管理的擴大範圍，加以不少的修改。

實則這兩個假定必有一個第三假定——就是不用完全推翻政治組織的舊形式的激烈革命手段，但是用由新途徑與新目標而利用這些舊組織的合法行爲，以促進計劃經濟制度。這個假定我也不加討論，因為我非另寫一書就不能盡述其義。但是我覺得我下這個假定，並無錯誤，因為事實上想改變英國目前經濟制度的基礎的大衆，希望用合法的方法，但非革命，以達到這變遷。將來由於英國或世界的事實的結果，這態度也許會改變的。但是現在這態度總是存在，而任何從現狀而著述經濟政策的人，非以此爲根據不可。我本人並不以爲這態度會改變得很快，除非由於外界的勢力之衝擊。因爲英國的資本主義雖日趨沒落，但除非世界的狀況不斷的惡化，則仍足以支持而不至於瓦解。

在過去的幾年中，英國的經濟制度已證明有抵抗世界極度的蕭條與金融紊亂之力量。英國雖說損失不少的國外貿易與國外投資的收入，然而除了失業的人民外，一般的生活標準沒有什麼劇烈的降落，並且一九三一年的狀況至少已稍有復元。在這些狀況之下，我以爲沒有理由假定英國的經濟制度是由其本身的動力，而趨向將釀成潰崩的恐慌。我卻以爲應假定劇烈的國際競

爭狀況，將使英國工人的生活標準之提高，較為困難，也許使這標準降低。我也以為應假定在資本主義實業的範圍之內，不能解決失業問題。但是這些如此危險與強大的勢力，本身不足以促成一個革命的狀態。假使這種狀態發生了，那末不是由於別處的完全潰崩，大大破壞了英國的輸出業，而竟使不能得到用以保持在適可水準上生活標準的最低量輸入品；就是由於世界大戰的復起。

不過在目前英國社會（包括英國社會主義的一般人）的見解之下，討論本國若因上述兩個原因之一而產生革命狀態，將變成什麼情形，是沒有多大用處的。無論如何我不承認關於這些可能性的議論，是在本書的範圍之內。我貢獻此書於讀者，不是說明英國或任何其他國家處於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政治制度的總潰崩之下，怎樣採用計劃；但是概述此時此地我們所碰見的問題——我們處於現狀之下，不得不在兩個途徑之間加以選擇，就是振興舊方針上私企業的努力，與代以不同的經濟制度以解放被禁的生產力及予全體人民以較為富裕的生活之企圖。

（註）本書所討論的各問題，有的在著者的其他著作中更加以闡明，例如（一）*Studies in World Economics*（一九三四年），（二）*Economic Tracts for the Times*（一九三三年），（三）*The Next Ten*

Years in British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y (1929年) 其他又見於(4) *British Trade and Industry* (1931年) (5) *The Intelligent Man's Guide Through the World Chaos* (1931年) (6) *What Everybody Wants to Know about Money* (1933年) 茲將有關的各主要研究列之於下，標題後的數字是指上述中有這更進一層討論的各書。

第一與第二章……我們未用的財富，(1) 世界恐慌，(5) 第三與第四章……近世經濟學，(1) 關於放任主義，(1) 對於新的經濟理論，(2)

第五與第六章……新資本主義，(3) 合理化，(3)

第七與第八章……輿論與貨幣政策，(2) 為什麼必使與怎樣必使銀行社會化，(2) 銀行業的社會化，(6) 貨幣的要素及其他要素，6) 銀行與信用，(3)

第九章……世界經濟的展望，(2) 消費者信用問題，(1) 工資，家庭津貼與人口，(3)

第十章……國際貿易的計劃，(1) 自由貿易，關稅與其他途徑，(2) (請參閱英國貿易與實業)，(4)

第十一章……社會化，(1) 社會化，(3) 社會化的要素，(2) 公營與半公營的事務，(2)

第十二章……勞工的編制，(3) (請參閱實業的自治 (1917年)，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新說 (1920年)，勞工統制與實業的自治小冊子 (1933年與新費邊研究社 W. Mellor 合著))

第十三與第十四章……英國貿易與實業，(4)

目錄與綱要

第一章 我們為什麼要有計劃……………

生產力超過了消費力的組織——閒逸與失業的不同——機械化勢力的性質——失業者的厄運——新污街陋巷替代舊的——「實業與商業區」——貨幣力——經濟學家的態度——技術家與管理者的態度——「金融人」與「機械人」——「利潤」對「物富」——高利貸款以致富的技藝——利率的趨勢——資本主義的宗教——機械人的困難——不採用社會主義的計劃？

第二章 生產的資源…………… 一七

什麼是生產資源？——人的資源——自然的資源——資本的資源——「人類使用東西」——專門與非專門的資源——機械化的影響——生產資源並不構成一個數目——資源的適應性——資本貨物的耐久性——經濟結構中各部分的不同適應性——農業的情形——生產資源必與慾望相連——陳舊的生產資源——陳舊的經濟學——勢力的陳舊——我們肯怎樣勤勉工作？——為價格制度而提出的辯護。

第三章 自由市場中的生產與分配……………三二一

計劃是分配生產資源的一個方法——什麼是「正當」的分配——「實在需要」的測驗——對於這測驗「適用的限制——個人的慾望與社會的需要——國家的行動如何影響於需要——使物品低廉或昂貴——改變收入的分配——收入是生產要素的價格——所謂的一切價格對於消費者需要的關係——貨幣的本身成爲一個目標能達到什麼地步——總價格爲消費者的願付之價所限制——成本與費用之間的均衡——借款與銀行製造的貨幣的影響——由於金融原因的不均衡——價格變動的不便利——額外貨幣的注入如何改變需要的結構——而由此釀成不相稱的生產——儲蓄與投資如何使本身停滯——投資替代勞力——恐慌的進展——過度儲蓄是否不可能的——生產力擴大時必須增加消費——貨幣的供給應否穩定——在什麼水準之上——債務的問題——價格爲購買力所限制——購買者怎樣分配他們的收入——替代與「兩可之點」——什麼規定物品價格——以及收入——企業家的行爲如何——邊際的生產力——因生產要素失履而起的困難——什麼是生產力——貨物與貨幣的生產力——購買者的獨裁爲生產要素的稀少所限制——「自由市場」中需要的不平等性質——價格反映目前的收入分配——改變收入分配就是改變需要與價格——任何分配制度都趨於自相延續——各生產要素的「經濟的優勢」——限制各要素的供給的力量——借用資本與投資——近世商業界的股東與債權者——我們必需一個計劃嗎？